

台湾威权政体转型原因探究^①

肖 瑶

(湖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 台湾威权政体转型处于亨廷顿所描绘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产生的时期。台湾威权政体民主化转型是台湾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西式民主政体示范效应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台湾威权政体是向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政体, 还是向一党独大政体的方向发展, 取决于执政者的政治选择和民众的政治参与。

关键词: 台湾; 威权政体; 民主转型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1-0056-04

Analysis on Taiwan's Authoritarian Regime Transition Reasons

XIAO Ya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s authoritarian regime appeared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depicted by Huntington.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authoritarian regime is the joint outcome of rapid loc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western-style democratic political model and a seri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s well. Whether Taiwan's authoritarian regime develops toward two-party or multi-party or one-party dominant ruling democracy system depends on the ruler's political choices and the mass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Taiw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ransformation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以下简称《潮》)一书中认为: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动因主要有经济发展、宗教改革、外部行动者在政策上的变化以及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而台湾威权政体的转型正是在亨廷顿所描绘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产生的时期。毫无疑问,以上因素都是有利于台湾威权政体向民主化转型的。一般来说,“威权政体”在台湾大多是指由蒋介石及蒋经国父子两人领导的政权,即自1945年台湾光复至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之间统治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政府。根据亨廷顿的理论,我们认为台湾威权政体民主化转型的动因主要有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主要是指存在于台湾

地区内部的因素,外部原因主要是指来自台湾地区以外的因素。

一 内部原因

(一) 经济快速增长

台湾经济发展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于1949-1953年在台湾进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提高了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据统计,台湾农业人口从1952年的52.4%、1960年的49.8%,逐渐下降到1989年的18.1%。同时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到1990年三大产业的比重已经为4.2%、

^① 收稿日期: 2010-07-29

作者简介: 肖 瑶(1985-),女,湖南涟源人,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42.3%对53.5%。^[1]第二、三产业在台湾地区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中产阶级数量也随之增多,标志着台湾经济结构成功实现了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其次是公营资本在台湾地区主导地位削弱,私营资本影响力逐渐增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通过将近十年的发展,到1989年,台湾地区的私营企业数目比1952年增加88倍,而同期公营企业却只增加15倍。从长远看,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为威权政体向民主化转型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经济结构成功转型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提高了社会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

(二)社会良性发展

台湾威权政体民主化转型除了快速发展的经济为其提供物质条件和力量基础外,发展的公民政治文化和国民党主动变革等其它四个因素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社会与政治土壤。

1. 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随着台湾出口加工工业的发展,经济结构成功转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政治参与与诉求都得到了提高。主要表现在中产阶级数量在一段时间内迅速增加,他们自身具备的自由、民主、平等、法制意识与“有纳税,无政治参与”的政治现实相矛盾,使他们的政治诉求愈发强烈,这与国民党在退居台湾后实行的戒严体制与恐怖统治格格不入。岛内党外人士趋向于支持反对派,主张用体制外的政治改革来实现政治诉求,这对国民党威权体制产生了民主化的“压力”。而外省籍的人士则偏向支持国民党,他们希望通过体制内改革加强统治,从而,国民党无需担心他们会反对自己的威权统治,殊不知这又为威权体制的自由化走向提供了“引力”。其次是民众运动增多。在1983年以后出现了大量的直接或间接挑战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民众运动。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7年,总共发生了1500余件人民集体行动的抗争,而且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光是在1986年一年内,就有1200余件大小不等的街头抗议活动,总共动员了约96305人次。^[2]这些数据说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力开始削弱,民众运动对政府政策制定能够产生一定的压力,进而影响政府制定政策,人们的民主参与意识也得到提高。这些社会运动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为台湾威权政体民主化转型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

2. 多个反对派力量的存在。亨廷顿认为要实现变革,主要依赖政府中的改革派与反对派中的温和派力量的结合,反对派力量的存在是他们与政府妥协、参与、适度交易的结果。台湾自从施行“政治革新”以来,除了国民党以外还存在多个政党,他们是民进党、中国自由党、亲民党、民主自由党、中国民主正义党、工党、中国民众党等。他们通过制定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党的章程来获得民众的支持,为社会运动提供必要的政治资源与信息,并且与蓬勃的社会运动互相声援,挑战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数据显示:1986年民进党在“立法院”首次竞选中仅获25%左右的议席,^[3]而到2000年民众支持率已高达79%。多个反对派力量的快速发展可以监督国民党实施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同时,多个政党之间的竞争对一党威权统治的合法性也会产生威胁。在台湾地区,一旦国民党威权统治存在不足,反对派政党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游行示威、议会竞选等)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统治。因此,多个反对派力量存在能监督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并对其统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为台湾威权政体民主化转型提供社会动力与政治力量。

3. 国民党主动变革。在《潮》中,亨廷顿认为威权政体要想成功实现变革,首先取决于政府与反对派的力量对比。当政府力量大于反对派力量时,政府可以实行至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在台湾,从1949年到2000年民进党执政前,国民党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认为:国民党政府拥有推动台湾政体和平转型的政治力量。其次,政治领袖的性格特征、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等主观因素对政治体制的转型同样有重要作用。也就是说蒋经国的个性因素在里面起了重要作用。蒋经国幼年在乡下老家目睹的中国贫弱让他记忆犹新,青年留苏的经历让他具有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党政军特权威与访美经历则让他兼具威权与民主的政治意识。这些互相矛盾的因素,在台湾政治发展的转型期对蒋经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力。蒋经国理性作出政治变革决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与其传统的镇压与收买的手法相反,国民党开始主导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着手“政治革新”。如在台湾地区推行“新人新政”,提拔“青年才俊”,现任国民党很多中青年领导人都是在这次改革中培养起来的;推行“本地化”,化解省籍矛盾,^[4]主动在台湾地区各级

地方政府公务员录用过程中录用本地人;充实国民党中央民意机构,缓和统治危机。政治革新的实行最终以1986年实现立法直选为突破,使台湾结社、组党合法化,推动了以国民党为主导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在台湾的发展。这一系列政治革新有利于多元化政策的颁布、施行和民意表达,同时也为一党威权统治向多党政治的转型提供了可能。

4. 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体制和恐怖统治,台湾的政治文化以政府下达指令,民众执行为主要特点。然而自从1987年解除报禁、党禁后,民众言论自由、媒体报道公开透明,使得社会对台湾地区的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主要表现在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使选举、投票制度化,鼓励民众参与政治;民众也逐渐改变以前以候选人“本地籍”和“外省籍”的区别选择政治领导人的观念;政党活动和参与形式多样化,规模也日益扩大(如通过言论针砭时弊、媒体揭发黑金政治、参与各级行政区域的选举、不同党派的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大打出手,争夺权益等);民众积极参与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各种社会运动、选举等。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也融入参与型政治文化中,如选举开始后政治候选人会“扫街拜票”,试图赢取更多选民对自己的支持;选举过后也会去“扫街谢票”,以此树立亲民的政治形象,并为下次竞选做好准备。这些形式为台湾建立参与型政治文化提供途径,动摇了国民党构建的统治型政治文化;同时为威权政体的转型提供精神支柱与智力支持。

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等内部原因是威权政体民主化转型的内驱动力。除此以外,西式民主政体示范效应等外部因素是威权政体民主化转型不可或缺的外在牵引力。

二 外部原因

(一)西式民主政体的示范效应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世界处于美苏两级对峙的格局,台湾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偏向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因此台湾地区政治深受西式民主的影响,其中又以美国式民主影响为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台湾政治变革是西式文化输出的产物。一方面,1949年后,美

国政府目睹国民党威权统治日渐“失去人心”的状况,逐渐扶持岛内国民党反对派势力的发展,迫使国民党当局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改革政治体制,以一个“民主、自由、稳定”的政体代替威权政体,以长期对抗大陆。另一方面,岛内青年出国留学主要是接受西式民主教育。他们回到台湾后也极力提倡发展西式的民主政治,这客观上宣传了西式民主制度,使台湾地区人们具有发展西式民主的意识与愿望。再者,20世纪7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欧洲出现后,并于80年代以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掀起了一个要求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统治的潮流。随之而来的是1986年2月菲律宾“黄色革命”推翻马科斯独裁政权的统治;1987年6月,韩国持续不断的学运,导致全斗焕政权的垮台,实现了向民主化的过渡。台湾与这些国家在政治、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近邻威权统治的垮台对国民党有“震撼”作用,同时国民党为加强统治不得不吸取教训,防患未然,主动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就是某些威权政权的垮台对其他威权国家统治者和反对派的信心所起的示范效应。^[5]

(二)大陆对台湾政策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大为改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使得两岸紧张关系趋向缓和。正是在这一形势之下,中国实现了对台政策由“武力解决”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性的转变。这一政策变化首先向台湾当局统治者提供了和平的信息;大陆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对台湾进行武力收复。台湾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可以自由发展本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其次,这一政策的变化对瓦解台湾当局“长期奉守的大陆政策的种种理由,如所谓‘共匪阴谋’等,在社会上日益失去了存在的市场。”^[6]国民党想在台湾地区继续维持以“戒严法”为主体构成的专制体制,也越来越失去存在的理由,其反民主的本质遭到社会多方面的挑战。所以,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台湾威权政体必须通过转型来重新构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赢得民众对统治的支持。

三 余论

综上所述,台湾地区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威权政体的转型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但正如亨廷顿在《潮》中所认为的那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否会回潮,我们不得而知。台湾的政治走向也是如此。我们能做的是根据它的发展趋势做一个大胆的预测,为台湾问题的解决从政治制度方面提供一些思路。

台湾地区经过“政治革新”,党禁、报禁解除,国民党党内实现了民主化改革,社会多个政党平行发展,民间社会力量发展壮大,政治上实现了民主化改革。以1986年的选举为标志,台湾开始了两党或多党参政的历史。亨廷顿在《潮》中写道:要想巩固民主体制,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通过选举实现政权的第二次易手。于2000年丧失执政权的国民党在2008年通过选举又重新走上台湾地区的执政舞台,这让我们相信台湾已经走在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政体发展的路上。

虽然台湾政体总的趋势是民主化,但是一旦走入扭曲的所谓“本土化”政治道路,一党独大制威权政体将出现回潮。在目前台湾地区选举中有些政党为赢取选票和执掌政权,有意挑动民众的“本土化”意识,排斥外省籍的政治领导人,使得社会省籍冲突加剧,其实质是想借“本土化”实现“台独”的阴谋。可以预测这些“本土化”人士取得政权后,必定会实行威权统治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合法性。因此不能因为现在台湾政体正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而排除威权体制在台湾再次出现的可能性。

台湾政治体制最终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这取决于统治者更取决于台湾民众对台湾未来发展的关注,并作出对台湾有利的政治选择。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执政者的主动变革、西式民主示范效应等内外因素,使台湾成功地实现了威权政体民主化改革,并使得民主政治在台湾地区逐步成型。纵观今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仍处于新旧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在和平与发展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台湾政治发展的民主化方向仍然是主流;万一出现民主化逆流,显然也是某些“台独”分子政治野心的显现,而这一逆流必然导致大陆与台湾在诸多问题上的合作会有更多的掣肘,进而阻碍两岸统一的进程。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史全生.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68.
- [2] 罗金义,王章伟.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162.
- [3] 凤凰网.1986年台湾选举结果[EB/OL].(2008-03-21). http://news.ifeng.com/special/TWDemocracy2/doc/200803/0321_3063_453659.shtml.
- [4] 钮汉章.台湾地区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77-79.
- [5]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19.
- [6] 郭传奎.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335.

责任编辑:骆晓会